

## 中国大陆媒介生态学研究综述

作者：陈楚洁

**【摘要】**2000年以来，媒介生态学（又称传播生态学、传媒生态学）开始引起我国大陆传播学界的研究兴趣，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并逐渐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及研究领域，呈现出研究全面铺开而又层次较浅的局面。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大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有关文献成果，试图做一个切近实际的概括。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 媒介生态 媒介生态系统 研究综述

### 一、关于“媒介生态学”

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又称传播生态学（communication ecology）、传媒生态学，在国际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历史并不悠久。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媒介生态学才逐渐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一。在最早（1968年）将媒介生态学确立为一门学科的美国学者尼尔·M·波兹曼的定义中，是指“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i]。它的根本关注点就是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并由此阐发以技术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如何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1988年，波兹曼又写道：“媒介生态学的目的是讲述关于技术的后果的故事；讲述媒介环境如何创造出语境，这些语境可能改变我们思考或组织我们社会生活的方式，使我们更好或更坏，更聪明或更愚蠢，更自由或更受奴役”。同样研究传播生态学的美国学者戴维·阿什德提出，传播生态即是情景中的传播过程，它包括三个维度：一种信息技术，一个传播范式，一个社会行为[ii]。而根据我国学者崔保国的观点，“媒介生态学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关注的是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iii]”。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学可以分为两大内容：一个是以媒介为中心，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另一个是以人类为中心，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

尽管中西方学者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无疑都将媒介视作一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而波兹曼的定义由于简约形象而被普遍引用。

### 二、国内最早提及媒介生态学的学者

2001年，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发表了两篇文章，开国内媒介生态学研究风气之先：一篇是《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另一篇是《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此后各种有关的论文、译著、著作的出版构成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兴奋点。

但根据有关检索资料，国内最早提及媒介生态学的应该是199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尹鸿。他在《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中指出，“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于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iv]。然而，尹鸿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电视媒介生态学，而只是强调“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电视媒介作为一种生态环境在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从而去培养一种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从根本上看，仍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

## 1、研究概况

研究人员方面，既有大学教授、讲师、研究生，也有媒体从业人员及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但仍以前者为主。文献成果方面，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媒介生态”“传播生态”“传媒生态”的论文共105篇，其中学术价值较大的是邵培仁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与《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张国良的《上海网络受众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抽样调查报告》[v]，崔保国论文《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vi]，骆正林论文《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vii]，单波、王冰论文《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viii]，陈星论文《试论史前媒介生态中非语言媒介的演变》[ix]。而专题译作有邵志择翻译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x]，国内第一本传播生态学著作则是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还有部分研究生所做的关于媒介生态的实证研究（如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赖浩锋硕士论文《中部地区传媒生态失衡与对策》[xi]，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张健康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社会营销的兴起为背景》[xii]），等等。学科建设方面，国内现有中国传媒大学开设的传媒生态学，分为基础传媒生态学、应用传媒生态学和定量传媒生态学三个方向。在学术研讨会方面，2005年由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伊利诺大学传播学院共同主办了中美媒介生态与媒介改革国际学术会议，中外学者就中美报刊批评、媒介改革、媒介角色等众多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xiii]。

## 2、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检索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国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媒介生态学基础理论

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媒介生态学本身，试图建立和丰富中国本土化的媒介生态学理论。如邵培仁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提出要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从而对传播过程中个人、群体、媒介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协作进行分析，梳理出五种具有较强解释功能的生态规律：传播生态位规律，传播食物链规律，传播生物钟规律，传播最小量规律以及传播适度性规律，并就相应的媒介生存策略进行了探讨和论述[xiv]。该论文无疑是将传播学与生态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典型，而实际上，其重点乃在于“媒介生存策略”。换言之，这是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注重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开山之作，因而也有别于北美传播生态学研究的技术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符号互动论等传统[xv]。此外，邵培仁在另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只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才能实现人与媒介系统、媒介系统之间的和谐、互动以及良性循环，杜绝信息超载、信息污染，或者信息枯竭、信息危机与信息霸权[xvi]。“媒介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类似的观点都闪现着思辨性。

而支庭荣则在其《大众传播生态学》一书中总结出传播生态的三个层次：一是作为传播原生态的媒介；二是作为传播内生态的传播活动和现象；三是作为传播外生态的传播制度安排。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其组织属性、信息属性和社会属性。[xvii]作者认为，直接孕育了大众传播生态学的知识体系学科，包括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并概述了达尔文进化论与动态分析、古尔德间断均衡理论与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纳尔逊及温特的演化经济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古登斯结构化理论等学科知识，从而在其后的章节中成功实现对媒介生态学的“嫁接”研究，为媒介生态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标示一种可能。

### (2) 媒介生态系统研究

崔保国教授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xviii]崔保国还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说 [xix]，并区分了媒介生态与媒介环境两个概念，认为媒介环境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媒介生态侧重于媒介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骆正林则提出，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媒介因素（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出版、音乐制作等）和环境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然资源、技术等），二者处于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xx]。

支庭荣通过评述德弗乐和鲍尔-洛基奇的媒介依赖理论（又称“传播的生态理论”），提出媒介生态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子系统，因而对社会大系统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同时它也是个动态平衡系统，一方面具有

一定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媒介生存内部和外部都存在大量变化不定、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的因素,因而当其中一个条件受到干扰而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影响整个媒介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建立新的平衡。[xxi]

也有研究者认为,传媒生态系统与外界不断进行信息传递与反馈,通过这种传递与反馈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系统内部机制作用实现系统的不断发展与革新。这些都源于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存在着特有的能量流动定律——传媒资源在配置、整合过程中产生巨大的爆发力,形成能量。而传媒所处的环境则为传媒的生产传播创造有利条件,成为能量的助推器。在二者的作用下,传媒对社会生活和公众产生了巨大的传播效应,能量由此形成动态循环[xxii]。但更多情况下,媒介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处于“平衡——失衡——平衡”的状态。在笔者看来,它不仅是一种非线性平衡,也是一种动态平衡。

针对受众生态环境,有学者认为,传播主体头脑中受众意识的偏离极易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资源的不平等、社会地位悬殊的加剧、媒介生态平衡的破坏。其表现为:传媒主要对准城市具有高消费力的受众,不重视广大的农村受众;农村受众媒介使用单一化,信息生态的绿色原则与多样性原则难以保证;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话语权。指出要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从而在媒介和受众之间建立更良好的依存关系[xxiii]。

针对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骆正林认为,公共政策影响媒介生态,主要是通过规范行为来调节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速度和数量上控制由环境流入到媒介的资源;规范媒体行为,引导媒介生态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建立新的媒介联系,拓展媒介生态的空间范围;调节市场的容量和结构,修补媒介生态环境。作者还指出公共政策影响媒介生态具有滞后性、初期对抗性、管理适度性、灵活性等特点。“在制定政策时,政府要做出具体而明确的技术判断,要充分考虑高度动态化的技术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并对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后果做出评估。在人为的有益影响下,建立新的平衡,达到更合理的结构、更高的效能和更好的生态效益”。[xxiv]此外,作者还就全球化及我国媒介政策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

支庭荣也认为,健全的传媒生态应是多元化的,不是垄断的“一言堂”。在传播生态建设中,要避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垄断。对于传播生态的管理,一是要倡导传播生态意识,重视动态的演化和博弈以及协同进化;二是要建立传播生态资源评估体系,其重点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利用状况;三是加强传播生态规划与监管。政府要通过对媒介内外环境的充分调查研究,选择符合传媒个体特征的发展决策;在监管上要做到调节与调控的适度性与力度性相结合。[xxv]

有研究者则通过对我国传媒生态的变化与集团化、集团化的成因与运作机制分析、集团化对媒介生态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跨媒体的集团化经营对传媒资源的优化等四方面的分析,认为传媒集团化是整合我国传媒生态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xxvi]

针对媒介行业生态环境,支庭荣认为,要维持媒介产业的生态平衡,一是要实现媒介市场的多元化,二是媒介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三是媒介产业适度集中,四是媒介行为要有战略视野。同时,作者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关键的少数和一般的多数”的规律,关键的少数带来危机和动力,通过竞争与合作实现传播产业的生态平衡,因而“关键的少数”是其维系所在。[xxvii]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研究尽管各有侧重点,但几乎都一致性的提出要对媒介生态系统进行整体、动态、平衡的分析,避免单一化的分解。正如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所言:“媒介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与其它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xxviii]

### (3) 媒介生态(学)与媒介形态

媒介形态是指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广告等具体的信息传播媒介。有关的研究一是以媒介生态学为研究视角,对媒介形态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进行分析。这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如,《新的媒介生态下报业的发展策略》(厉国刚,2006),《解析学术期刊问题的媒介生态学视角》(但瑞华,2007),《广播传媒生态论》(申启武,2007),《传播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王炎龙,2005),《凤凰:起舞在何方?——浅析凤凰卫视媒介生态的定位》(江光亮,2006),《以人为本:数字媒介生态与广告传播》(张庆梅,2007),《从传播生态学角度审视新闻舆论监督》(李淑芳,张开荣,2006)等。大部分论文从媒介生态系统平衡观出发,认为我国当前媒介生态处于不良的失衡状态,表现为:社会处于转型期,制度建设较为滞后;经济处于增长期,产业发展有较大空间;媒介行为处于重塑期,短期行为往往“竭泽而渔”。而“事业”与“企业”双重身份的束缚,成为我国媒介生态区别于国外媒介生态的显著特殊性。有关论文均以媒介生态学倡导的平衡观和绿色理念来阐释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

二是针对媒介形态的变化或传播活动的发展对媒介生态的影响,论证和深化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如,《网络媒介对中国传媒生态的影响》(张涛甫,2006),《互联网背景下的传媒生态演化》(王永亮,程红霞,2007),《论新闻娱乐化对媒介生态的影响》(蒋剑波,田玲玲,2007)等。

可以看出，媒介生态学的分析视角或理论框架，开拓了媒介及传播现象与活动研究的新模式，也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

#### （4）媒介生态学与“三农”传播

从2003年起，“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国家重要战略的位置，而媒体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力也大为增强，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研究“三农”传播、总结经验及得失的文章逐渐增多。将媒介生态学应用于“三农”传播研究，不仅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有利于更客观、全面地看待农村传播生态现状并提出有效对策。赖浩锋就认为，农村传播生态是整个传播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更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孱弱的一环，对它的研究更需要有生态学的视角和系统的观念[xxix]。赖浩锋在“江西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和“江西信丰县安西镇农民传播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对中部地区的农村传播生态进行分析，指出我国农村传播生态存在结构和功能的双重失衡，进而提出平衡农村传播生态要增强生态意识、服务意识、协作意识和市场意识；政府要加强“三农”传播的扶持力度，构建服务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媒介素养教育。赖浩锋认为，当前对农传播的实际突破口在于优先发展对农广播电视。[xxx]闵阳也在“陕南农村大众传播状况调查”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该地区农村大众传播媒介的畸形结构与传播功能严重失衡的现状，提出改善和条件农村媒介生态的途径：政府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实行政策倾斜；媒体确立“农民情结、农民视角、农民内容”的传播思想；社会各部门通力合作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xxxi]二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都从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的观点中汲取了营养——“传播事业的社会责任的体现，须有三个方面——政府、媒体和阅听大众同时着力，缺一不可。”但似乎也可见有关研究还缺乏更深的发现和本土化构建。

#### （5）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素养

戴维·阿什德说，传播生态学关注传播的技术因素是如何以相当独特的方式影响传播内容的，本质上，传播生态学意在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行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为社会秩序服务的[xxxii]。而传播牵涉到意义的转换，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它们给讯息以形式，包括构建这些信息的受众或接收者与该媒介的相互作用[xxxiii]。在这一意义上，媒介素养对实现媒介生态的良性发展显然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南京大学教授段京肃认为，媒介生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媒介素养，取决于媒介人的媒介素养，取决于社会的管理者的媒介素养。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是从根本上优化媒介生态环境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将意味着对媒介活动和媒介所传播信息的鉴别、鉴赏能力的提高，从而刺激媒介进行调整和完善[xxxiv]。

可以说，媒介生态学视野中的媒介素养研究，不是单纯的受众媒介素养研究，而明显含有系统的观念，这是区别于一般媒介素养研究的特点[xxxv]。

#### （6）其他研究

除以上问题外，我国大陆传播学界也关注媒介生态学理论起源及演变、西方媒介生态学学者思想研究、将媒介生态学应用于媒介发展史研究等。

有学者认为，我们若要修正或批判西方学界中约定俗成甚至已形成特定学术团体、理论流派的核心术语或概念，首先应该了解其来龙去脉，然后再赋予新义。如，单波等人详细梳理了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脉络，论述了芒福德、埃吕尔、麦克卢汉、波兹曼、哈弗洛克等在不同时期对媒介生态理论起过重要贡献的学者及其思想。他们认为，媒介生态理论自有其价值，但也不可否认其存在诸多理论和现实的困境：理论体系不坚实；科技话语的过多呈现掩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xxxvi]

熊艳红则针对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存在对“媒介生态”概念界定的模糊等问题，通过梳理媒介生态的理论模式（赖利夫妇模式、媒介系统依赖模式、大众传播过程图式）与国内外媒介生态研究的起源及发展，认为以往研究对媒介生态的界定受缚于结构化与静态分析。作者认为，媒介生存环境生态与媒介系统及其作用之后所形成的媒介意义环境生态，三者相互影响，在动态与平衡中一起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媒介生态。[xxxvii]

此外，有学者尝试将媒介生态学应用于媒介发展史研究，以史前非语言传播媒介为切入点，在史前媒介生态的背景下，分析史前非语言媒介的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以及各种形态的演变轨迹，从中探讨史前非语言媒介对人类思维及交流活动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史前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媒介无论是内在的思维模式还是外在的生活方式对群体的影响都大于个人；更突出的影响着原始人的认知结构、情感信仰乃至生死存亡。[xxxviii]

此外还有媒介生态中的新闻法制建设研究、中西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差异等，限于篇幅和笔者知识能力，暂不作概述。

### 3、研究方法

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我国媒介生态学在吸收了传播学、生态学、信息技术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上，研究方法逐步走向定量研究（1）抽样调查报告，如张国良教授的“上海网络受众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抽样调查报告”；（2）内容分析法，如《中美媒介生态与脱口秀节目》、《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的差异》；（3）个案研究，如《大众媒介的缺席与传播的畸变——以

“SARS”传言之例》、《传播生态视野中媒介事件的构建——以“超级女声”为例》；（4）实地调查，如《中部地区农村传媒生态失衡与对策》），以及文化（人类学）学研究，如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一书第9章《大众媒介与文化生态》。

#### 四、综述小结

综上，我国大陆媒介生态学研究以应用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少；大多为介绍式和探索式的研究，仍谈不上构建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2001年以后，有关的文献成果数量增加速度较快，但质量上参差不齐，甚至处于低水平的重复状态，与我国传媒市场的变迁和发展大不相称。多数文献成果基本上以邵培仁及崔保国的论文为基础，在他们提出和界定的概念范畴上展开验证和补充，较少突破。整体上看，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是借生态学的概念进行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也有人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一个长处是能充分结合我国传媒市场发展需要，发挥本土的优势，并可能建立异于西方学界的理论体系；不足的是，过于关注政策及策略，有可能最终因受困于现实而无法突破，也不大利于中外学术对话。

此外，未解决的问题还表现在：

（1）研究的逻辑起点、关键概念与学科范围的界定上尚不明晰。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不可否认具有多学科视角，但从理论体系的建构来看，学科范围的界定是首要之事。而作为基本元素的逻辑起点和关键概念，也出现使用上的混乱和模糊，如媒介环境与媒介生态的混淆[xxxix]，又如因研究宗旨差异而对概念的界定各异，总体上都不利于学科自身的建设。

（2）理论体系建设应明确定位。支庭荣认为，传播生态首先是一种视角，其次也是一个综合研究的交叉领域。虽然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无不存在这种问题，但笔者认为，本质上媒介生态学仍要回归到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解释传媒生态危机现象和革新研究范式方面，确实展示了它的魅力。但抽象范畴的研究，显然更为重要。如果更多的被当作一种研究视角，将难以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和创新。

（3）问题的研究有待加深，如媒介生态各项指标的建立、测量和评估，以期定量地反映媒介生态状况及变化（如传媒市场格局与竞争态势），媒介生态史研究（或曰媒介生态的演化与发展），不同媒介的动态平衡分析等。

####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译本，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论文及报告引用：见注释。

作者简介：陈楚洁，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04级新闻传播学系学生，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媒介与社会发展等。

---

[i] 李晓云：《媒介生态与技术垄断——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ii] 【美】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译本，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iii]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iv] 参见《电视研究》，1996年第5期。

[v] 见《新闻记者》，2000年第7.8.9期；

[vi] 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vii] 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

[viii] 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

[ix] 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3期；

[x] 【美】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文本，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 [xi] 见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xii] 见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xiii] 荆楚网：中美媒介学术交流启幕，<http://www.cnhubei.com/200511/ca926748.htm>；
- [xiv]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 [xv] 如崔保国教授认为，1990年代以来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递特质，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
- [xvi]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 [xvii]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4页；
- [xviii]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 [xix] 即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系统、信息储存系统、信息传播系统和信息接收系统。
- [xx] 骆正林：《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
- [xxi]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 [xxii] 李铭，王秋馥：《由传媒生态危机引发的思考》，《新闻传播》，2004年第12期；
- [xxiii] 马震刚：《媒介生态学视野中受众意识偏离现象分析》，《现代视听》2005年第12期；
- [xxiv] 骆正林：《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
- [xxv]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305页；
- [xxvi] 张向明：《中国传媒生态资源整合的有益探索：集团化》，《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 [xxvii]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22页；
- [xxviii]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xxix] 赖浩锋：《中部地区农村传媒生态失衡与对策》，见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xxx] 同上；
- [xxxii] 闵阳：《陕南农村传播媒介生态分析与对策》，《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xxxii] 【美】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译本，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 [xxxiii] 同上，第9页。
- [xxxiv] 段京肃：《追求人与媒介的完美结合——浅论媒介生态与媒介素养》，[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zjlt\\_lw\\_view.jsp?id=5177](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zjlt_lw_view.jsp?id=5177)；
- [xxxv] 纵观国内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论文，笔者发现，我国媒介素养及教育研究在确定主客体这一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且大多是关于受众的媒介素养及教育。
- [xxxvi]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
- [xxxvii] 熊艳红：《重新审视媒介生态理论》，《青年记者》，2005年第12期；
- [xxxviii] 陈星：《试论史前媒介生态中非语言媒介的演变》，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
- [xxxix] 如媒介学者何道宽就认为，北美的Media Ecology与国内的Media Ecology的研究实际上不是同一回事。前者不能翻译为“媒介生态学”，而应该翻译为“媒介环境学”。

回首页

来源：传播学论坛编发  
阅读：1956 次  
日期：2007-09-11

【 双击滚屏 】 【 评论 】 【 收藏 】 【 打印 】 【 关闭 】 【 字体：大 中 小 】

上一篇：报业布局与收入结构的案例分析

下一篇：奥运精神的张扬——从纪录片《同一个梦想》看奥运报道的立意和思想性

>> 相关文章

- 200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述要
- 一本源自新闻实践的有用的书——读张征《新闻采访教程》有感
- 解读手机传播
- 学派、理论化与新闻理论研究的障碍
- 负面报道的概念释疑
- 新媒体生态特质与优势构建

发表评论



点 评:  字数0

用户名:  密码: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蜀ICP备05000867号

设计开发：阮思聪 QQ:54746245 Powered by: 打瞌睡

Copyright (c) 2003-2013 传播学论坛： 阮志孝、阮思聪. All Rights Reserved .